

译介之旅

翻译给了我什么

□姚 媛



姚媛，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英语系副教授。主要译著有《世代相传》《身着狮皮》《少年Pi的奇幻漂流》《南极》《亲爱的生活》等。

我曾经下过决心：下一次出版社问我愿不愿意做翻译，我一定要说“不”，可是，下一次，本想说“不”却脱口变成了“好”。

我对翻译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爱。在加拿大狭小的公寓里，每天晚饭后，我盘腿坐在沙发上，翻译《亲爱的生活》，夏天、秋天和冬天，没有一天不如此，稿费是人民币1300多元。从出版社拿到《少年Pi的奇幻漂流》，我放下正在写的博士论文翻译。当时并不知道几年后故事会被搬上荧幕。虽然译著不算科研成果，对晋职称称毫无用处，但我仍然花了很多时间做翻译。

没有一种爱是无缘无故的。我对翻译如此执著，翻译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我多次自问。偶然回顾十几年来走过的翻译之路，似乎突然找到了答案：翻译给了我一个自在而丰富的世界，让我不断认识自己。

我们生活在一个飞速发展的世界，生活裹挟着我们匆匆往前走。但是，翻译与此正相反。它大多数时候要求译者独自工作，独自沉浸在作品里，细细品味原作，慢慢打磨译文。这时，四周的一切都变得安静、遥远，甚至时间也走得慢了，纷乱的思绪不见了。这样的时刻非常美妙，不仅因为我的心是静的，更因为我发现我的心可以安放在一个安静的空间里，不被喧嚣忙碌所扰乱。

很多人慨叹“身不由己”，但翻译却相对自在。我相信很多译者做翻译仅仅是因为喜欢，而不是为了追逐名利——因为几乎没有名利可以追逐，也不是迫于种种压力——这个时代的压力大多与名利有关。翻译的过程不带功利的目的，也就不会受到复杂因素的牵扯和羁绊，不会患得患失，焦躁不安。这是多么难得的自在。

当我做翻译时，常常发现自己闯进了意想不到的知识、情感和思想领域，一个更加丰富的外面的世界在我面前展开，丰富了我的内心世界。

对于专业知识技术的描写和富有异域特色的地理历史、动物植物、风俗礼仪等，我坚持尽量准确地翻译（哪怕作者对沙发面料的描述，我也绝不含糊——我相信一只猫跳上平绒沙发和跳上真皮沙发的画面在读者心里形成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我曾查过伐木、建桥、航海等也许不做翻译就一辈子也不会涉及的知识；我曾在翻译《世代相传》时辗转得到斯里兰卡驻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的帮助，请他在地图上为我标出当地地名，向我描述当地的植物、动物、香料；也曾在翻译《少年Pi的奇幻漂流》时查阅各种资料，给作者写邮件，了解印度教的神祇、传说、思想。

驳杂的知识是我窥见不同生活状态的窗口，我见有这样的一个（群）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做着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如何与他（们）的生活交织，影响了他（们）对生活的体会和看法。有时候这让我感到自己的渺小狭隘，因而变得谦卑平和；有时候这让我感到自己拥有无限的可能；当我用自己的声音把他们的生活再叙述一遍时，仿佛我已经结识了这些人，经历了这些生活。

有时候，翻译的过程延伸到原作和译文之外，延伸进我的生活之中。翻译《亲爱的生活》里的《火车》时，一直没弄明白overhead notch究竟是什么。去年圣诞节，我乘火车从费城去纽约，乘务员查了票后，顺手把票插在前排椅背上方。原来那里有一个槽口（notch），用来插车票，好让乘务员对乘客应在哪一站下车一目了然。故事里的士兵在逃离，他跳车前拿走车票，也就抹去了自己的踪迹，只不过他的车票不是插在椅背上，而是在头顶上方（overhead）的行李架下面！翻译中的细节给旅途带来惊喜，旅途中的细节让翻译变得顺利。

在一个故事里，贝尔出门挤奶时“had a rope round the back door to hang on to”。如果只把这句话的字面意思翻译出来，会让人不解。一次，在一家小餐馆吃饭，隔壁桌的老大爷和我聊起来，说他曾在休伦湖畔的农场生活。我突然想到那根绳子，于是问他：“冬天你要用绳子吗？”老大爷非常惊讶，他告诉我，有一次他没有在家门和工具棚之间拴绳子，结果因大雪差点在自己的农场里迷了路。

与思想的美做伴

□严蓓雯

赵一凡翻译的优秀译本，让我可以在前辈的基础上稍稍加以补充和完善，另外自己也积累了一点点翻译的经验，才一心一意翻译起来。就这样，从初始无知无畏的莽莽，慢慢开始了小心翼翼的脚步。

越做越喜欢的翻译

10多年过去了，翻译的书籍、文章累计已有百万余字，回头看来，自己也很吃惊。翻译这份工作，起初并非自己的专业计划，但慢慢做下来，居然对它越来越喜欢，越来越难以割舍。一本翻译完，没有新工作的间歇，隐隐还有些惆怅。对它的依赖，最初可以说出于十分私人的原因。刚开始翻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时，因为经历一些变故，心情十分低落，一方面打不起精神做任何事情，一方面又很懊恼地看着时间白白流逝，正好这本需要翻译的书送到我手上，而且又有合同的最后完成期限，那就找不到任何理由去对付、去拖延，于是强迫自己坐在电脑前，每天都有几个小时，忘却现世的苦痛，进入别人的精神境界。

渐渐地，我却喜欢起这种有规律的生活来；而且，原著作者的思想广度、看待问题的视野以及运用材料的有趣细致，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未知世界。翻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时，贝尔

对美国后现代消费文化的畸形发展、所谓相对主义对文化传统的损害等描绘，令我时时联想到当下的中国；在后现代全球化经济的裹挟下，如何为个人和社会谋求更美好的未来，我觉得贝尔的著作给中国提出了警醒，也提供了前车之鉴。同样，印度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在《后殖民理性批判》里对世界南北格局的反思与批判——西方如何借帮助之名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新的压迫、经济全球化如何使女性贫困国家穷苦妇女进行压榨，这些睿智的思想火花令我在翻译中一次次掷笔赞叹。而鲍吾刚的《中国人的幸福观》在探讨中华民族对幸福的追求时，征引文献不仅遍及中国经典典籍、佛藏道藏、近现代学者论著，还涉及许多对中国学者来说都相对冷门冷僻的材料。在寻找这些材料的原文时，我借此也对中国的思想积累进行了一番探索之旅。犹记得在天津绿荫掩映的古籍馆里查抄原文的宁静与欣喜，这一切，是翻译带给我的。

慢慢的，我做翻译不再是为了排遣忧伤、打发时光，相反，我快乐地沉浸在那个世界里，随着一本本书的译成，我不仅将作者的思想变成了中国的汉字，感谢作者，他/她的文字也带我进入了一个更广阔、更美丽、更丰富的世界。

学术翻译与文学翻译

说实在的，我来谈翻译，很多是外行之语，在前辈及专业译者面前，我几乎没什么资格开口。我是中文系毕业，翻译英文著作，相比英语系毕业的人，先天就有很大的缺陷；而就学术素养和对理论的把握，也跟前辈有着很大的差距。能稍微说一说的，可能是有幸跨越了文学翻译和学术翻译两个领域，其中的差别之大，只有实践后才能体会。

从一开始无知无畏地闯进了学术翻译领域一样，最开始，我也没想过我能译小说。这里要感谢我的同事萧萍女士。前两年她受译林出版社之托，组织翻译《2011年欧洲最佳小说》，找到我说，你也来译几篇吧，我看过你的微博，很喜欢你的文字感觉。感谢她的信任，我也跃跃欲试。自以为对英文的理解经过了几年的训练，应该有不少提高，又自恃自己文字语感尚可，平时也爱看小说，译个短篇应该不在话下。谁知道，多年学术翻译虽然让我力图表达准确，但某种程度上却过于依赖原作者，失去了灵性，放不开手脚。平时拿手的文学语言像被遗忘一样。当我打开萧萍修改过的译文，深深感觉到文学翻译与学术翻译是如此不同！学术翻译某种程度上就像做题一样，每一句话都有一个终极，有时未必是第一次翻译就

可能的选择变成了可能的共存甚至超越，让译者的处境看上去不那么为难。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当我把难译的句子或段落写下来，改变用词和语序，试图做出比较和选择时，有时仍然感觉困惑。我应该在什么时候，妥协到什么程度？对原文的神似可以通过何种形式表现出来，这个“神”又是什么？译者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主体性？

《身着狮皮》中的人物没有像《世代相传》中的人物那样在不同的语言文化身份之间左右为难，而是相互融合，最终抹去文化的界线，小说中的多伦多因从一个非此非彼的城市，变成亦此亦彼的城市，并向着超越彼此转化。

在彼此之间选择，暗示了彼和此各有其不变的本质，中间的界线难以跨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和在小说中一样，没有什么纯粹不变的。每一种语言和文化都与其他语言文化相互接触、交叉、融合，不断吸收新的元素。原作就是这种变化的产物——它使用的语言是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语言，并被作者赋予了新的意义，它表现的文化是经历了发展变化的文化，并因为作者的理解和视角而发生新的变化；并且，在它完成的一刹那，就已经不再是作者创作的那个“原作”，而成为读者阐释之后的新的作品。

译文同样如此。首先，翻译起始于并非一成不变的原作。其次，翻译的过程是一个转化的过程，语言本身和语言之外的东西都会发生变化。

译文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个沙砾坑旁边。不是那种用庞大的机器挖出来的大坑，不过是一个很多年前某农场主一定用它赚了点钱的小坑。实际上，它太浅了，会让你认为它可能有别的用处，也许是房子的地基，只是后来房子没盖成。坚持让大家注意那个坑的是妈妈，“我们现在住在加油站那条路上的老沙砾坑旁边。”她对人说，然后哈哈大笑，因为她很高兴摆脱了和镇上那座房子有关的一切，街道，丈夫，她过去的的生活。我几乎不记得那段生活。也就是说，我清楚地记得某些部分，但无法将之拼成一幅完整的画面。我脑子里关于镇上那座房子的记忆只有我以前房间里画着玩具熊的墙纸。在这座新房子里——其实是一座拖车房——姐姐卡罗和我睡两张窄窄的小床，上下铺。我们刚搬去的时候，卡罗和我说了很多关于以前的房子的事，努力想让我记起那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她会谈这些，通常说到最后我什么也不记得，她就会很生气。有时候我想我其实记起来了，但因为我记得的和她说的相反，或者因为害怕记错了，所以我假

装不记得。我们是在夏天搬进拖车房的。我们把狗带来了。布丽兹。“布丽兹喜欢这儿。”妈妈说。这是真的。那只狗不喜欢把镇上的街道换成开阔的乡村呢，即便镇上有宽敞的草坪和高大的房子？它迷上了对每一辆开过的汽车吠叫，好像这条路是它的，还时不时叼回家一只被它杀死的松鼠或土拨鼠。刚开始，这让卡罗感到很苦恼，尼儿和她谈了一次，向她解释了狗的天性，以及某些东西必须吃其他东西的生物链。“可它有狗粮啊”，卡罗争辩说。但尼儿说：“假如它没有呢？假如有一天我们都消失不见了，它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呢？”“我不会”，卡罗说，“我不会消失不见，我会永远照顾它”。“你真这么想？”尼儿说。然后妈妈开始干涉，让他转移话题。尼儿总喜欢开启美国人和原子弹的话题，而妈妈认为我们不应该谈论这些。她不知道当他谈论原子弹的时候我还以为他说的是原子弹。我知道这个理解不太对劲儿，可我不愿意提问，然后被嘲笑。

——姚媛译艾丽斯·门罗《沙砾》



严蓓雯，女，197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编辑，译作有《中国人的幸福观》《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虚拟的寓言》《后殖民理性批判》等。

译文

在全球包围那必须却又不可能的任务中，其中一项是所谓“抵制发展”，这是另一种发展的策略：组织家庭工作者——“血汗”条件下在家工作的女性。这类女性劳动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之前，因此在线性轨迹上，它处于居先位置。在全球性中，它是一早就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残留现象的继续恶化。在国际转包合同和如今后福特资本主义的状况下，它从阿兰群岛的血汗工厂，一直到在家工作的高科技计算机终端。如今全世界的女性，都身处这一抽象的、用词不当的整体（“共同命运”）中，通过在家工作，消化了行政管理、健康医疗、工作场地安全及其等等的费用。我们必须因此学会不要将在家工作视为外国现象，就好像它不过是无偿家务劳动的延续。我们必须一直努力去解构家庭和工作的断裂（我们的全球斗争的意识形态认为这是断裂），从而能抵达这一女性基本层面（同时也是最高层面——性别化通过展示阶级联盟而

运用它），它支撑了当代全球资本。我们必须面对这一艰难真相：女性自身内在化了的性别区分，被认为是“文化”书写内的伦理选择，当它以一种心甘情愿的信念接受了性别歧视的同时，也接受了剥削，这一信念认为，一个好女人应该这么做，它甚至是女人应有的伦理。我们必须非常努力去通过一些法律，而且也要非常警惕它们是否被贯彻实行。但是，斗争的真正力量来自于实际运作者，她们思考以下可能性：组织起来反对家庭劳动，并不等于就不再是一个好女人、一个负责任的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因此是有丈夫有家庭的女人）、一个女人；也只有在那时，在一个双向回应的结构中，我们一起走向一种预设的可能性，而这一做法不仅仅是双向思考：做一个好女人，方式有很多。

——严蓓雯译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后殖民理性批判》

了。我不喜欢译小说先看一遍，这样，译的时候，作为读者的初始情感反应，就会自然融入到手下的译文中。

最近，由于青年译者孙仲旭的去世，翻译话题又一次成为热点。我跟孙先生年纪仿佛，虽然没有他投入那么多，但对翻译、对文学、对艺术和美的热爱是一样的。如今有些读者对译者怀某种敌意，其他语种可能好些，但英语因为已经成了中国年轻人的必备技能，似乎人人能读（读得懂读不懂是另一回事），所以翻译英语写成的作品，更容易被挑剔，动辄就说“错误百出”。我不否认，翻译界有些粗糙的译作，但我相信，从事翻译这一行的，大多踏踏实实。我觉得，这样一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相对来说报酬又非常非常低廉的工作，从事它的人都非常可敬，尤其是年轻人，生活、工作压力都非常大，那还挤出时间来做什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果真非常不容易。不过话说回来，人生短暂，迅如流星，做一份自己喜欢、又让别人有所启发有所感动的东西，是非常幸福的。能跟文学的美、思想的美、艺术的美打交道，在我看来，很有价值，很满意，很满足。